

# 教师生活与工作的质性研究

INVESTIGATING THE TEACHER'S LIFE AND WORK

[英] 艾沃·古德森 著

IVOR GOODSON

蔡碧莲 葛丽莎 等 译



教育科学出版社

Education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 教师生活与工作的质性研究

[英] 艾沃·古德森 著  
IVOR GOODSON

蔡碧莲 葛丽莎 等 译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 京 ·

出版人 所广一  
责任编辑 孔 军  
版式设计 贾艳凤  
责任校对 贾静芳  
责任印制 曲凤玲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教师生活与工作的质性研究 / (英) 古德森著; 蔡碧莲等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3. 10  
书名原文: Investigating the teacher's life and work  
ISBN 978 - 7 - 5041 - 7961 - 6

I. ①教… II. ①古…②蔡… III. ①教师—生活—研究  
②教师—工作—研究 IV. ①G4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12313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 - 2013 - 7025 号

### 教师生活与工作的质性研究

JIAOSHI SHENGHUO YU GONGZUO DE ZHIXING YANJIU

---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 9 号

市场部电话 010 - 64989009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电话 010 - 64981167

传 真 010 - 64891796

网 址 [http: // www. esph. com. cn](http://www.esph.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制 作 北京大有图文信息有限公司

印 刷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69 毫米 × 239 毫米 16 开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9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23 千

定 价 22.8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译序 古德森教授学术思想介绍

特纳在其风行全球的理论教科书《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中，有关“理论的本质”的论述在不同版本之间有着非常微妙的变化。前几个版本还洋洋洒洒地谈理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从第七版开始，特纳的态度突然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径直宣称“理论是有关事件怎样和为什么发生的故事。因此，社会学理论就是有关人类如何行为、互动和组织自身的故事”<sup>①</sup>。

如果我们认可特纳这一“理论观”的话，认可理论就其本质而言乃是一种叙事的话，那么在了解某一理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提出这一理论的理论者有所了解，我们有必要知道这位理论者到底是谁，他有什么样的人生经历和学术经历。对于古德森教授的《教师生活与工作的质性研究》这本书来说，情况也不例外。下面我们简单了解一下古德森教授的生活史与学术史。

古德森教授出身劳工阶层，并且毫不避讳这一事实，反复强调劳工阶层的家庭出身决定了他研究的基本立场：为学校教育场域中处境不利的学生和老师发出声音，并不断努力揭示出造成教育场域中弱势群体不利处境和不公正待遇的社会历史与微观政治原因。与一般的教育研究者不太一样，古德森教授不仅有着教育学领域扎实的学术训练和理论基础，也受过经济学和历史学方面严格的学术训练，更有着近十年的中学一线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经验。

出身劳工阶层的古德森教授认为教育曾经改变了他自己的命运，所以他

---

<sup>①</sup> 乔纳森·特纳，2006，《社会学理论的结构》，邱泽奇，张茂元，等，译，华夏出版社，1页。

想帮助更多的劳工阶层子弟也能通过教育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因此,1968年,古德森教授放弃唾手可得的博士学位,辞去金斯顿大学讲师职位,决心不再从事与自己生活和兴趣无关的学术研究,不再为富家公子和千金们服务,毅然决然地去了一所综合中学任教。他相信在新兴的综合中学中,来自弱势阶层的学生将和来自优势阶层的学生受到同等的待遇,他希望自己在综合中学中能帮助更多的来自弱势阶层的学生。在任教的过程中,古德森教授产生了许多关于学校教育实践的困惑。概括地讲,就是为什么即便教师在教学的时候对不同社会阶层出身的学生一视同仁,学生也几乎同样努力的情况下,劳工阶层子弟的学业依然不如中产阶级与优势阶层子弟优良,劳工阶层子弟在学校中的处境依然不容乐观。古德森教授认为除了伯恩斯坦的“编码”理论与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揭示的原因以外,社会历史建构出来的学校课程也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却经常被忽视的原因。于是,古德森教授在任教近十年之后,毅然再次放弃拥有的一切到年轻的苏塞克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英国中学课程的“社会史”,即一门课程是如何经过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和斗争而最终取得官方认可的合法地位的。古德森教授凭借对中学课程形成的社会历史机制的出色研究不仅顺利拿到博士学位,更引起欧美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古德森教授的博士论文中文版由南京大学贺晓星教授等翻译并于2001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名为《环境教育的诞生》。

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数年间,古德森教授从事了一系列关于课程的社会史研究。与以往课程研究要么侧重社会建构要么侧重历史演变的研究取向不同,古德森教授的课程研究很好地将社会学与历史学的视角结合起来,尤其是侧重微观历史的考察。这一新的研究视角将课程的社会建构与历史发展中各种社会势力之间的博弈,以及围绕有限社会资源之间的斗争完整而清晰地揭示了出来。因此,在国际课程学界,古德森教授有着广泛的学术影响力。曾任国际课程学会主席的威廉·派那教授称古德森教授为“当今课程领域最重要的一位学者”。美国出版商 Sense Publishers 2009 年出版了两本和古德森

教授课程研究有关的著作，一本是《课程研究领域的领导者》<sup>①</sup>，另一本是《全面、深入而智慧的理解：课程研究中的生活史与生活政治——威廉·派那与艾沃·古德森教授的对话》<sup>②</sup>，这两本书都将古德森教授在课程领域的研究放在很重要的位置。正是凭借着在课程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古德森教授在拿到博士学位后短短六年就成功地获得了正教授的职位。

在课程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之后，古德森教授的学术焦点开始转移到一个很当下的实践问题上：为什么全球范围内轰轰烈烈开展的，以提高学校效率以及满足不同社会阶层群体教育需求为目标的课程改革与教育改革大部分都失败了？围绕这一问题，结合自身的学术视角和实践经验，古德森教授开始关注教育改革中的教师问题。在考察以往有关教育改革的研究的过程中，古德森教授注意到了教师这一被以往研究忽略的角色。在古德森教授之前，大量的有关教师的研究停留在宏大叙事的水平上，试图通过对教师角色的设定标准等一系列应然性的研究来解决教师在教育改革中的不适应的实际性问题。这种理论应然和实践实然之间的巨大脱钩，造成了教师研究缺乏理论的创新与实践的关怀。古德森教授通过引进生活史视角，在研究中将教师作为一个整体的“人”予以展现。在教师生活史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晰地从教师的视角了解到教育改革背景下教师的生存状态，了解到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体的人在教育实践中所遭遇到的各种问题与困惑。从教师生活史视角出发，我们就可以很好地理解为什么那些以市场化为底蕴的旨在提高学校教育绩效和课程标准化的改革大部分都失败了。可以说，教育政策制定者对教师考虑的不充分和教育理论研究者对作为最主要教育实践者的教师的忽视是改革失败的最根本原因。“生活史”理论在教育改革和教师研究中取得了一系列推进之后，古德森教授将生活史理论在方法论层面进行了提升与规范，并发现了一个新的理论增长点：叙事与学习的关系。目前古德森教授正

① Edmund C. Short, Leonard J. Waks, Leaders in curriculum studies, Sense Publisher, 2009.

② José Augusto Pacheco, Whole, bright, deep with understanding: Life story and politics of curriculum studies: In - between William Pinar and Ivor Goodson, Sense Publisher, 2009.

在进行的欧盟课题就是围绕着这一主题开展的。

通过以上对古德森教授学术研究轨迹的非常粗线条的回顾，我们不难发现，古德森教授是一位实践意识非常强烈的理论研究者。他的所有研究可以说都是围绕着一个很明确的实践问题而展开的。简单介绍完作为理论“研究者”的古德森教授之后，我想我们非常有必要了解一下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人”的古德森教授。

可以说，在现实生活中古德森教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性情中人”。1968年，在即将完成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博士论文和拿到哲学博士学位之际，伯恩斯坦的一篇论文《开放的社会》将他彻底“解放”了，他放弃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唾手可得的经济学博士学位与金斯顿大学的讲师职位，可以说几乎放弃了一个劳工阶层子弟在学校里近十年刻苦奋斗所获得的一切。古德森教授觉得这些东西远离自己的生活世界，远离自己的人生理想，远离自己的思考兴趣，他想做一点和自己的生活相关的，和自己的兴趣相关的，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与意义相关的工作，因此，古德森教授到了伦敦教育学院接受教师资格培训继而到综合中学任教近十年。

在中学任教近十年后，古德森教授带着自己在实践中遭遇的困惑和阅读的理论积淀来到苏塞克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拿到博士学位以后，本来可以凭借自己出色的博士论文留在苏塞克斯大学任教，但1978年“不满的冬天”却改变了古德森教授的人生轨迹。古德森教授热烈支持的轰轰烈烈的工人罢工运动最后以失败草草收场，这使他对英国撒切尔政府开始有点心灰意冷，碰巧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能提供一个职位，古德森教授便携全家远赴西安大略大学任教。之后，他在西安大略大学开展了一系列原创性的出色的课程领域的研究，并在该校获得正教授职位。对于欧美学界而言，加拿大还是处在一个相对边缘的位置，于是在学术上取得一系列学界公认的研究成果之后，古德森教授转战美国，在纽约罗切斯特大学华纳研究生院谋得一份教职，领着十分优厚的教授薪水。无奈2001年，令古德森教授讨厌的“保守的右派”

小布什当选总统，于是，古德森教授再次毅然放弃“美国的薪水”<sup>①</sup>，回到自己“英国的乡下”。一开始在东安吉利亚大学任教，后来转战布莱顿大学。布莱顿是苏塞克斯郡的首府，是古德森教授获得博士学位、结婚和自己唯一的儿子安德鲁出生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不仅是古德森教授现实的家乡，更是古德森教授精神的家园。

以上我们对古德森教授的学术经历与人生经验的大概介绍，我认为可以用以下四句话来概括：劳工阶层的社会出身让古德森教授始终站在弱势群体的立场发出声音；实践意识让古德森教授的研究始终关注教育改革与实践的一线问题；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学术训练让古德森教授能以更宏观和细腻的理论视角来审视教育实践；作为性情中人的古德森教授的研究充满了自己鲜明的个性特色。

这种鲜明的个性特色体现在古德森教授学术研究的方方面面。首先就是古德森教授的著作大部分采取的历史学、政治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研究方法。这种综合性的研究视角一方面取决于古德森教授自己受到的学术训练，另一方面也与古德森教授研究的教育实践这一主题密切相关。这种研究视角将教育实践的历史生成与社会互动以及教育场域中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博弈与斗争完整地揭示了出来。

我曾询问古德森教授历史学、政治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优势体现在何处，他这样回答道：第一，人的行为不仅受社会情境的制约，更是受到历史经历的影响；不仅是社会建构的，更是历史生成的。他很推崇布迪厄“惯习”这一概念，他认为这一概念很好地说明了个体行为的历史生成。第二，任何宏大叙事都无法代表处在弱势地位的个体的声音。因此，我们必须要让教师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必须要了解教师的生活史。第三，个体不是被动接受一切制度的制约和指导，而是有着自己思想和偏好的能动者，如果某一制度和政策不受行动者的内心认同，那么行动者就肯定会以各种策略来

---

① 林语堂的人生新四大快事：“领美国薪水”，“住英国乡下”，“吃中国美食”，“娶日本太太”。

抵抗这一制度与政策。

这种鲜明的个性特色还体现在古德森教授的语言风格上。古德森教授的论著行文风格比较晦涩，行文中大量涉及社会科学各个不同研究领域的专业词汇。我曾半开玩笑式地问他为什么论文语言风格如此晦涩，弄得论文有点像伯恩斯坦的“局限编码”，非内行不能看懂也。他这样回答笔者，“我曾经在学校里因为语法和用词不够得体而受到老师的批评，今天，我要用最好的词汇和语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一点和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风格比较接近，并且，布迪厄也是劳工阶层出身。或许，童年那些学校教育中不太愉快的生活经历让这些思想家终生难以忘却。

(高 政)

# 目 录

|                                      |     |
|--------------------------------------|-----|
| 译 序 古德森教授学术思想介绍 .....                | 1   |
| 导 论 .....                            | 1   |
| 第一章 走进教师的生活与工作 .....                 | 4   |
| 第二章 教学研究中生活史方法的应用 .....              | 26  |
| 第三章 生活史访谈指南 .....                    | 53  |
| 第四章 生活故事资料的运用：故事情节、文本和社会<br>情境 ..... | 62  |
| 第五章 变革时代的职业生活 .....                  | 77  |
| 第六章 学校的真情故事 .....                    | 84  |
| 第七章 “学生生活是你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 .....          | 103 |
| 第八章 生活史与专业实践：资料的处理 .....             | 117 |
| 古德森教授近年来的主要著作 .....                  | 131 |
| 译后小记 .....                           | 133 |

## 导 论

过去的几十年，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人们对于诸如教育哲学、教育史这样的基础学科的理论有一种抵触情绪。他们认为，理论的学科基础性质使得研究者脱离了教师的实际工作世界。

因此，许多反叙事的研究试图重新进入实践工作者的世界，并在这样的意识下开展研究。诸如教师故事、“反思性实践”、行动研究等，都是这种回归行动回归实践的例子。

然而，针对这些研究的一项调查反映了一个共通的问题：这些进入教师的实际工作世界的回归经常看不到与实际工作之历史背景的联系，也看不到与一般意义上的理论认识、学科认识之间的联系。如此一来，在把教师带回教育研究时就导致了一种吊诡的结果：削弱了教师对于背景，对于政治，对于各种制度以及各种理论的理解。进入实际工作世界并把理解的问题抛给别的领域，它们事实上做的仅仅是“规训”教师。由于只关心教学过程的行动目的、实践目的，它们对于行动以及实践的历史变化，对于这些行动和实践如何在不同时代以不同形式被社会、政治地建构起来，缺乏理解的努力。某些采用了行动研究和实践性反思方法的研究不仅规训了教师，而且也规训了研究者。

当务之急是这样的一些研究，它们能够紧密连接教师的生活世界，而且又能系统地与历史、政治和理论等建立联系。斯滕豪斯（Stenhouse）很久以前就主张，需要一个“扎根在理论境脉中的行动故事”。而他认为，历史的方法能够为这样的整合提供平台（L. Stenhouse, 1977, p. 7）。

本书旨在讨论如何为实现理论建构开拓更广阔的视野。斯滕豪斯 1982 年去世后，一个名为生活史的新的研究领域业已形成，这一领域旨在把教师的行动故事放到历史背景中去分析。这一努力使得我们不仅能够去关注教师的生活世界，还能去关注政治与社会的脉络，关注各种历史的模式和参数。

我们呼唤一个“理论建构的相遇场所”，它能把教师生活世界的研究与学校生活的主题以及历史背景结合到一起。教师生活史为研究提供了这样一个人文意义上的场所，而历史理解之方法的开发，使得针对政治与理论背景的、视野更为广阔的讨论成为可能。

新的教育理论尤其将会改变以下三个方面：

- (1) 研究的历史背景以及本质性理论；
- (2) 研究的呈现方式；
- (3) 相遇场所：行动和理论在此将得到充分的讨论和精致化。

生活史与历史的方法在以上三个层面将个人的、实践的、理论的东西，以一种新的方式结合起来。

以上这些方法，引导人们在“中范围”层面开发理论：这一领域，处在结构性的组织和政治背景与教室中教学的日常生活之微观细节之间。中范围理论寻求连接自下而上的视角，关注各种策略和组织形式。这些策略和组成形式对应于宏观组织结构与政策背景的各种变化。通过关注中范围层次的本质性理论，在这一层面，可以产生出许多与日常教学现实的联系，以及——从另一角度说——与结构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的各种经典理论的联系。

本书的前两章讨论教学研究中的生活史运用、怎么倾听教师的声音以及教师的各种表现形式。这两章的目的是要提出一种观点，即主张在对教师以及教学的理解中使用生活史研究。这两章也要对各种教师叙事和教师生活史取向的运动做更深入的评析。恰如所述，这些是当下许多西方国家新出现的运动，必须在如下的背景中理解：越来越强调分析的实践取向，以及作为其结果，分析越来越远离学科的、理论的话语。生活史研究的目的，是要重新评价和摆正行动世界的位置，并重新将行动世界与理论世界连接起来。本书

主张,就现代教育重新连接行动和理论来讲,生活史是一种特别富有成效的方法。第三章和第四章描述了生活史访谈的一些基本要点,当然不是说已经穷尽了生活史访谈的所有要点,但为那些开始使用这种方法的学生和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引导。我们讨论了生活故事资料的使用,并提供了几个实例。

对倾向于生活史方法的学生和研究者来说,为他们提供生活史研究的实例是非常重要的。因此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讨论了几个生活史的例子。认识到以下一点很重要:生活史研究并不只关心对教师的生活史访谈,还包括了对更广范围的文档资料的复原和分析,以及一些其他证词的收集。第五章通过工作在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的某一特定教师的素描,展示了这一生活史资料收集的成果。第六章和第七章通过展现一幅学校生活的画面,更详细地讨论了生活史资料的运用。

最后一章讨论生活史与工作实践,就教师生活与工作的研究做了一些总结,并且展示了这些资料如何能够拓宽人们对于教师和学校教育工作的理解。

## 参考文献

- Goodson, I. F. (1994). *Studying curriculum: Cases and methods*. Open University Press, Buckingham/Teachers College Press, New York/OISE Press, Toronto/probably in Australia by George Allen & Unwin.
- Stenhouse, L. (1977). *Case study as a basis for research in a theoretical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education*, Centre For Applied Research In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Norwich.

(贺晓星 译)

# 第一章 走进教师的生活与工作

最近几十年，有关教师生活和工作的研究在数量上有所增加，质量上有所提升。在霍布斯鲍姆（Hobsbawm）所谓的西方社会“黄金时代”终结的1975年，霍布斯鲍姆（1994）和洛蒂（Lortie，1975）在著作中总结了美国教师研究与教育研究之间的关系。虽然那时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与今天已经十分不同，但其论断在今天看来仍然站得住脚。

学校教育长于规范（prescription），短于描述（description）。在有两百万教师的公立学校中，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一般认为，正规教育中最核心的那一部分只会在教师和学生对彼此都满意的时刻才会发生。然而尽管关于教师在学校中应该如何表现的著作和论文汗牛充栋，关于教师工作的经验研究和学校生活实际情况的真实记录却是少之又少。（p. vii）

可以说，洛蒂指出的这一点在今天有关教师的研究中依然适用：有关教师工作标准和应然形象的研究大量涌现，却罕有关于教师实际工作情况与应然形象的严肃研究。然而，尽管学术研究具有相当的连贯性，却也不时会有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存在于当教育事业处在十字路口的时候，存在于教育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发生大变革的时代。

洛蒂之后过了十年，鲍尔和我（Ball & Goodson）在《教师的生活与职业生涯》（*Teachers' Lives and Careers*，1985）一书中指出英国学术界对教师的研究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已经走过了一系列重要的阶段。

在教育事业已知或者未知的领域里，教师都以一种很模糊的形象出现。通过对教师社会地位的大规模调查研究与历史分析，发现理解教师教学实践最关键的概念是教师所应该具有的种种“角色规范”。（Ball & Goodson, 1985, p. 6）

因此，在那十年的大多数研究中，教师以集体的形象呈现。这种集体形象通过精确的统计数据得以体现，个体被认为只是一个角色的载体，机械而忠实地扮演社会对教师强大的期待以及教师的“角色规范”。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旨在解决上述研究范式一系列弊端的教师研究之新的方法开始有条不紊地得以开发。个案研究的研究者开始将学校教育作为一种社会过程来加以审视，关注点聚焦于学生在学校中如何被“处理”的方式和过程上。研究者的同情主要集中在学生身上，尤其关注工人阶级子女、女生等课堂中处于被支配地位的群体，而教师则被认为是这种支配关系的“始作俑者”（Ball & Goodson, 1985, p. 7）。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们看到教师研究的主要关注点转移到了教师工作中的那些限制性的因素上——教师在研究者心目中的角色从处于支配地位的“始作俑者”变成了受制度情景约束的“受害者”，在一些案例中，教师只是在制度压力下被各种规范约束着从事着工作（Ball & Goodson, 1985, p. 7）。

至关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的研究取向上，教师是“受害者”这一点开辟了“教师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与生活”这一研究的新领域。在1981年的书中，我认为那时的研究者并没有正视教师工作的复杂性，并没能正视教师作为一个能动的主体在积极地创造他（她）自己的历史。

即使研究者已经不再将教师视为数量上的总和、历史的脚注和忠实的角色扮演者，但仍然将教师视为在变换时空条件下的不受时间影响的、可互换的一群人。因此，我们需要新的研究方法。

对个人资料和传记资料的研究能迅速挑战教师“可互换”的假设。同样，通过追踪教师随着时间变化不断演变的生活，追踪教师的整个职业生

涯，追踪几代教师的职业生涯，关于教师不受时间影响的假设或会得到纠正。要理解诸如教学这样的高度个性化的实践，把教师作为个性化的人来了解就显得至关重要。在这方面的知识缺乏正是社会学想象力萎缩的直接明证。生活史学家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这一角度强调个人“自己的故事”的价值。（Goodson, 1981, p. 69）

不幸的是，尽管在教育研究这个学术共同体内有关教师生活和职业的研究不断涌现，但整个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却开始朝着与此相反的方向剧烈变化，这些事实反映在这一时期的大量研究当中。对教师的政治与行政控制模式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涉及（教师自主）权力和清晰度的诸多方面，表现为教师形象再度变得模糊，教师必须面对新课程纲要（在诸如新西兰和英国等国家，这种新课程纲要表现为一种无所不包的国家课程），必须面对教师绩效评估与问责制，必须面对一系列新的政策的约束以及学校管理与治理的新的方式。

## 教师工作与教学研究的新方向

近年来，某些质性研究者的工作开创了一些新颖、有趣的途径来达成对教师个人实践知识的理解（Connelly & Clandinin, 1989）。在教师个人实践知识的学术研究中渗透进对人的侧面的分析，确实是一个积极的进步，正如这些研究所体现的那样，它强调了生活历程以及人格方面的重要性。另外一些关于个人实践知识的研究传统主要集中在教师作为反思性的实践者、教师作为自己教学实践的研究者以及其他的一些关于教学实践的现象学方法上。个人经历因此与教学实践随大势所趋结合到了一起。教师工作被认为是他（她）自己的实践。对教师而言，这种有特色的聚焦很好理解，但是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也许能产生更为积极的效果，这种积极的效果不仅体现在认识上，更体现在有关教育实践知识和教育公共政策的反馈方式上，体现在更广阔层面的理论理解上。

“反思型教师”与“教师作为研究者”的教师教育模式中有着相似的预设。“教师作为研究者”模式暗藏着一系列问题，强调教师成为自己实践的研究者看起来似乎将学术界的研究者在教师教育过程中的责任弱化了一些。但我认为，学术界的研究者有一个最基本的但似乎又有些被忽略的责任，就是倡导教师作为研究者并为此给予持续的支持。由此，发展出了多种新的取向，这些取向反对这样一种观念：如果将教师看作研究者，那么教师最主要的研究应该聚焦于其教学实践。

某种意义上说，对实践的聚焦其实是“教师作为研究者”的逻辑结果，与之相对的是“研究者作为教师”。

教师的工作是一种社会和政治建构。影响教师实践的构成因素，无论是个人经历的或政治的，范围都较宽泛。将研究的焦点置于“界定的实践”（practice as defined）上，就是使研究成为特定历史条件，特别是政治势力的牺牲品。在许多方面，“市场的力量”正如新右派政治家所言，正努力使教师的实践转变成为一个毫无主见的技术人员的实践，一个预先设计方案按部就班的执行者的实践，一个既定内容的平庸的实践者的实践。接受这些定义，并把重点放在清晰界定的“实践”上，就等于接受了这种思想。通过一种狭隘的视野来关注实践，界定学术界研究视域的主动权就等于被迫交给了政客和行政官僚。如果学术界能够以一种更为宽阔的研究视角审视“教师作为研究者”，必定会有更多的自主的和批判性研究成果涌现。我们需要很好地超越这种我称之为“实践原教旨主义”的束缚（Goodson, 1995b, p. 145）。

新的研究传统旨在将我们研究的视域拓宽到生活史与传记研究（Goodson 1981, 1988, 1992; Goodson & Walker, 1991）、集体记忆（Butt, Raymond, McCue, & Yamagishi, 1992）、教师专业与微观政治知识（Goodson & Cole, 1993; Russell & Munby, 1992），以及一系列有趣而具创新性的女权主义者的研究（Acker, 1989, 1994; Delhi, 1994; Smith, 1990）中。这些研究追求拓宽对于教师教育与教师发展的关注点，从而包括有关社会、政治、情境、群体等各个方面。